

朱寿桐 ◎ 主编

“汉语新文学” 倡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罪

“汉语新文学” 倡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新文学”倡言/朱寿桐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161-0331-9

I. ①汉… II. ①朱…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3549 号

责任编辑 王 曦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人	赵剑英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64073835(编辑) 64058741(宣传) 64070619(网站) 010-64030272(批发) 64046282(团购) 84029450(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		
字 数	336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倡 言 编

汉语新文学概念建构的理论优势与实践价值	朱寿桐 (5)
汉语新文学:作为一种概念的学术优势	朱寿桐 (25)
论汉语新文学的文化归宿感	朱寿桐 (44)
汉语新文学的文化伦理意义	朱寿桐 (58)
“汉语新文学”的功能优势及研究方法	陈国恩 (76)
浅议“汉语新文学”的价值取向	
——兼谈“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文缺陷	汪应果 (83)
“汉语新文学”之我见	汪应果 (88)
“汉语新诗”概念与视野重建	傅天虹 (92)
论“汉语新诗”的理论运行与美学价值	傅天虹 (102)
汉语新文学:一种文学范围的学术呈现	朱寿桐 (111)
试说“汉语文学”概念	朱寿桐 (117)
汉语新文学的“外国群落”	
——以泰国诗人曾心为例	吕进 周婷 (124)

汉语新文学中的洛夫诗歌 程光炜 (132)

汉语新诗与汉语新文学的学术辩证

——从诗人傅天虹的文学状态与学术追求谈起 朱寿桐 (138)

讨 论 编

作为跨文学共同体的汉语新文学 马利安·高利克 (153)

“新国学”·“文化的华文文学”·“汉语新文学” 王富仁 (174)

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在何时? 严家炎 (194)

谈汉语新文学的研究 黄修己 (205)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内涵: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 顾 彬 (212)

重建中国文学的整体性

——从文明的角度重识中国文学 张未民 (220)

“汉语新文学史”:一个新的文学史概念的意义和局限 张全之 (242)

有关“日本文学”和“日语文学”的研究

——作为“汉语新文学”论的补充 岩佐昌暲 (249)

韩国的“中国新文学史”之类著作与“汉语新文学史”的

编纂问题 朴宰雨 (259)

论汉语新文学中的韩国元素作品 吴 敏 (270)

《文心雕龙》和汉语新文学史的撰写原理 黄维樑 (284)

“汉语新文学史”中的知识/权力问题 李 怡 (305)

建构汉语维度新文学史的价值与意义 吕周聚 (310)

迷失的“中国” 宋剑华 (321)

评 论 编

汉语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论《汉语新文学通史》的学术创新 汪应果 (329)

新概念 新框架 新诠释

- 评朱寿桐主编《汉语新文学通史》…………… 古远清 (334)

新概念、新体例

- 评朱寿桐主编的《汉语新文学通史》…………… 吴 敏 (338)

以“自己的话”来书写“现代的”汉语文学史

- 读《汉语新文学通史》…………… 赵凌河 (346)

历史叙事与体裁史格局的困境

- 汉语新文学史编集体例的思考…………… 周仁政 (355)

- 汉语新文学史写作体例摭谈…………… 罗执廷 (371)

综 述 编

- 关于汉语新文学概念的第一波讨论…………… 朱寿桐 (387)

文学史写作的一座里程碑

- 《汉语新文学通史》新书座谈会纪要…………… 雷淑叶 (393)

“汉语新文学”概念引起普遍关注

- 汉语新文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张冬明 (399)

- 校后记…………… (407)

倡言编

汉语新文学概念建构的理论 优势与实践价值

►» 朱寿桐

汉语文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辉煌的积累，其中新文学的研究经过近百年的建构、开拓与发展，亦以其不断扩大的规模与日益充实的内蕴，成为文学研究学术格局中颇为活跃及颇具潜力的学科。不过这一学科从概念而言尚缺少有力的学术整合：明明都是以区别于传统文言作品的汉语各体新文学写作为内涵，却被习惯性地分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不同领域，各自凸显的乃是时代属性或空域属性，汉语新文学整体遭到了人为的切割且被切割得有些纷乱、错杂。“汉语新文学”的概念整合不仅能够相关学科的设置上克服上述纷乱、错杂并奏删繁就简之效，而且有利于相关学术领域学术规范性的建设。汉语新文学研究者即使面对一些并不科学并不规范的学科概念也习惯于保持默认姿态，轻易放弃了汉语新文学名实关系的思索与论辩，其结果往往导致学科的纷乱与学术的失范；缺少明确、稳定和科学的学术内涵和外延的支撑，相应学科的学术规范性便会受到频繁的干扰。根据学术范畴的一般原理，学术活动乃由“构成性规则”

和“范导性规则”所规范，而“构成性规则”是基础，也是核心。^① 汉语新文学研究领域被长期分割成上述明显缺乏学术整合且相互夹缠含混的学科板块，正是其“构成性规则”相对紊乱的体现；而其“构成性规则”的紊乱直接导致“范导性规则”的薄弱，学科的规范性建设因而显得任重道远。

以白话文为主体语言写作的现代文学，从其诞生之时就被先驱者命名为“新文学”，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建构，从某种意义上是对新文学“名学”传统的恢复。新文学的命名体现着先驱者对所倡导和建设的文学性质、形态，特别是其所必然体现的新的文学传统的深刻认知与准确把握，从而构成了汉语新文学概念坚实的学术基础。这一学术基础中的语言因素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卓越的凸显，虽然它在后来的学术论辩中遭到了不应有的忽略，但现代文学和现代语言理论都聚焦于以语言界定文学的学术必然性，这使得汉语新文学概念取得了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等约定俗成概念的某种理论优势。各种文学史写作和文学研究的学术实践亦表明，这样的理论优势正在逐步得到学术现实的认可。

一 “新文学”作为概念内核的历史依据

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基本内核当然是“新文学”。至少在文学革命先驱者和新文学基本建设者的印象与习惯中，“新文学”比后来俗称也是通称的“现代文学”更易于接受，因为“新文学”概念全面地包含着与传统文言即所谓“旧文学”相对的白话写作，以及作为文学革命的积极成果这两层含义，而不是像后来通称的“现代文学”那样偏重于凸显其时代属性。

^① 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6 页。

同时，新文学概念反映出新文学家建构新文学传统的全部命意，而新的文学传统才是新文学全部根性与特征的典型体现。于是，以“新文学”统称区别于传统文言的所有汉语写作，具有深刻而充分的历史依据。

新文学一语的使用，或与梁启超时代的新文体、新小说诸说有密切的联系，但作为一种文学概念，则在文学革命运动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新文学”作为术语，当始见于1917年2月1日陈独秀致陈丹崖信，在这封信的开头，陈独秀便对陈丹崖来书“详示对于新文学之意见”表示欢迎。新文学概念的正式使用则始于3个月后，胡适于1917年5月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以历史比喻的方式将“新文学”作为白话文学和文学革命成果这两层含义表述得相当明确：“古文家又盛称韩柳，不知韩柳在当时皆为文学革命之人……其时白话之文未兴，姑韩柳之文在当日皆为‘新文学’。”^①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发难者和文学革命的始作俑者之一，胡适对“新文学”的这两层含义深有心得，在此后“提倡新文学”的一年时间内，他一直盼望着“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来取代“桐城”派的古文、《文选》派的文学、“江西”派的诗、“梦窗”派的词以及《聊斋志异》派的小说等陈腐的旧文学。^②此后，人们虽然不再像胡适那样强调文学语言的白话化以及文学革命，但新文学概念逐渐为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新文学倡导者和实践者所一致认同并沿用成习。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是这一历史性认同的集中体现，而在此之前，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新文学”已经作为学科名称出现在大学课堂，至少，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周作人在辅仁大学都曾分别讲授过“中国新文学研究”和“中国新文学的

① 《胡适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②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源流”。^①此后“中国新文学”的概念一直被沿用不辍，即使在“中国现代文学”等概念后来居上并大有取而代之之势时，新文学概念仍被证明有其悠久的学术生命力。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文学”或“中国现代文学”概念逐渐露出了取代“新文学”概念的端倪，至50年代形成大势气候；这种将主题词由“新”到“现代”的转变，除了特定气候下的国体与时代因素的政治考量而外，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也相当关键。刚刚开始运作这样的概念更替之时，“中国新文学”概念也刚刚得到了普遍的学术确认，一些研究者便从反思乃至批判新文学的角度提出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概念以示另辟蹊径，这方面最初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乃是钱基博出版于1933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这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先行态。钱基博不满于新文学，不无偏执地将新文学视为“胡适之所以哗众取荣誉，得大名者”，^②因而自然不同意将“民国纪元以后”的文学概称为“新文学”，而是认定新文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主要成就还是这一时期的“古文学”，它们都属于“现代文学家”的创作与操作。这样的概念把握虽然基于一种偏见，却较之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正统概念更显得健全与科学，因为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概念沿用者基本上都没有将现代历史时期的“古文学”视为自己的当然研究对象，直到近些年在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有限的几部文学史专著中，才部分地体现出类似的自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30年代初期钱基博等人想到用“现代文学”概念冲击“新文学”，并不是先知先觉地意识到“现代文学”概念在此后的文学学科发展中更具优势，而是体现了对那个时代特别流行的“现

① 均有讲义为证。朱氏讲义后人整理为《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1982年刊载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论丛》第14辑；周氏讲义仍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题，1932年由人文书店发行。

②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72页。

代”一词的敏感与呼应。那时正是中国在战乱频仍的短暂间隙中向世界现代化潮流大规模开放的辉煌时刻，特别是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文化生活直逼西方摩登时代的前沿风气，“现代”与其译音词“摩登”势已成为时代文化的关键术语，“现代文学”作为一个流行概念以取代“新文学”一度成必行之势。那时《现代》成为最具影响的文学刊物之一，更富有象征意味的是，《现代》的前身乃是《新文艺》。《新文艺》改为《现代》，作为关键词的“新”为“现代”所取代，正喻示着“新文学”概念将让位于“现代文学”。虽然研究者仍习惯于沿用“新文学”概念，但“现代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早已隐然成势。据称，杨振声在燕京大学开设的有关课程便称“现代文学”。^①

新文学概念强调的是与旧文学的相对性，较多地融入了传统因素的考量，所揭示的仍然是文学的内部关系；而现代文学概念关注的是时代因素，无论是从政治内涵还是从摩登含义来考察，都是将文学的外部关系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其所具有的历史合理性以及相应的学术含量都不如新文学概念。新文学倡导者无论如何偏激地反对旧文学，都是在价值观念上承载了旧文学传统的巨大压力，因而迫切地追求新的文学传统，铸成新文学，以求得解放与超脱。他们深知旧文学具有丰厚的文学传统，文学革命运动对于旧文学所反对的其实不是所有的文学家及其文学作品，而是其所体现的文学传统，即陈独秀所谓“陈陈相因”的文学“形体”，以及“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的文学“内容”；于是，在斥责贵族文学、古典文学与山林文学之余，并不回避对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柳、元、白以及“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的称颂与赞赏。^② 同样，胡适反对代表过去“时代”

① 萧乾：《我的副业是沟通土洋》，《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1期。

②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

的旧文学，也不过因为旧文学所体现的“古典主义”传统“当废”，^① 这并不影响他提倡整理国故。周作人、沈雁冰等在组建文学研究会时立意将建设新文学与整理旧文学联系起来，在改革《小说月报》时也承认给“旧有文学”一席之地，以肯定其“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都说明他们对于旧文学传统的价值承担。对于新文学倡导者和建设者而言，旧文学传统力量是那样地巨大而沉重，一般性地注入时代性因素难以形成克服乃至抵御的力量，于是，文学的“现代”内涵远没有文学的“新”传统的铸成更有力度也更加重要，这便是新文学作为概念远胜于现代文学的深层原理。

因此，作为新文学概念的“新”并不是像人们一般性地理解的那样，体现着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等等，这种浅表层面的新确实可以用诸如“现代”或“当代”等时间概念来替代；新文学概念之“新”乃是吁求着新的文学传统的建立，尽管这种新文学传统在不同的新文学家的表述中有所参差：在胡适的表述中常有“真文学”与“活文学”之称，在周作人的表述中则为“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在陈独秀、沈雁冰的表述中似成“写实文学”之类，在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表述中常是“为人生的文学”。这些都是先驱者试图建立新文学传统以摆脱旧文学传统的思想印痕。新文学家们在提倡新文学、抨击旧文学的同时，每每对新文学创作的成果多有不满，同时对传统的经典文学充满敬意，但他们之所以能在这样的心态下坚持新文学的方向，其奥秘乃在于对新文学传统的自信与坚持：唯有从新的传统的角度才能使得新文学家充满着面对旧文学的信心和勇气，任何别的因素，包括时代性因素都无法赋予他们这样的信心与勇气。尽管胡适一贯倡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理论，正像他一贯力倡“白话文学之为文学之正宗”，^② 但他们却并不十分强调“真文学”、“活文学”

① 胡适：《寄陈独秀》，《新青年》第2卷第2期。

②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号。

的时代因素，更不认同“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的摩登色彩，相反，他们主张普通的抒情写世文学，表现人生之一般的文学，而不是成色十足地体现时代因素的文学，因而，新文学概念比现代文学概念更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更能体现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更具有文学理论的学术厚度。

热衷于“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概念建设的人们无一例外地忽略了“新文学”概念的这种新文学传统命意。对于新文学传统的忽略使得新文学概念在时代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强调中变得灰暗不堪。如果说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为标志，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者还有可能在新文学概念与现代文学概念之间找到徘徊的余地，则“中国当代文学”概念的出现宣告了新文学作为学术和学科概念的历史性地位。中国当代文学最初是以诸如“新中国文学”或“建国以来的文学”作表述，^①内涵上体现出当代中国的某种政治强势，于是在五六十年代之交^②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既成格局，将汉语新文学从与传统文学的诸多纠结中擢拔出来，完全成了具有时代活力和影响力的批评概念和学科命题。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相整合的概念，一个叫做“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临时性学术概念和明显拼凑型的学科名称便就此出炉，并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汉语新文学领域最具权威性和最富范导力的概念，其影响正越出中国内地而辐射到中国港澳台地区乃至国外的汉语文化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正式的学术概念，无论是在内部关系还是在外部关系上都失去了概括力度以及延展的张力。就内部关系而言，正如人们早已质言过的，它号为

① 这样的表述不时地出现在一些重要文章和专著之中，如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文艺报》1959年第18期；茅盾：《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辉煌成就》，《人民日报》1959年10月7日；还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组编著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等等。

② 一般认为以如下两部集体编著为标志：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山东大学中文系编写组：《1949—1959中国当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中国”现当代文学，却约定俗成地放弃了对汉语文学以外的中国其他民族语言文学的涵盖，同时在时间意义上也难以达到当年钱基博的认知水平，将这一时段的“古文学”涵括进来。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外部关系来探讨，正如人们尴尬地发现的，尽管台港澳从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范畴内似乎并不能，也似乎从未打算理直气壮地包括台港澳文学的内容，在长期的理解习惯和学术实践中，中国台港澳文学在被边缘化的同时也似乎已经取得了相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某种特殊地位，这样的基本事实早已宣告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学科名称的涵盖力受到人为的限制。至于离散到海外的汉语文学写作，则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更不能为这一学科概念所涵括。没有人怀疑海外汉语文学写作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之间的血肉联系，汉语新文学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在海外各地，其实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正式概念，与继之而起的海外华文文学等概念构成合谋契约，人为设限、强拉硬拽地试图将它们拆卸为不同的板块。这样的学术尴尬只有通过强调新文学一脉相承的新传统来加以克服，任何时代性或地域性的分割与强调最终都必须让位于新文学传统的统驭。^①

① 其实，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大多早已经意识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合法”概念的不合理，其相关的文学史著述往往一直处在左冲右突试图寻求概念突破的努力之中。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现象是：较全方位地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与课程方面的专书，例如文学史及各种资料集，在陈飞主编的《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所提供的目录中可搜得184部，其中以“现当代文学”为中心概念设计题名的仅为4部，其他，以“新文学”为中心概念的22部，以“现代文学”为中心概念的93部，以“当代文学”为中心概念的53部，即使是以“20世纪”或“百年文学”为中心概念的也有12部，在数量和比例上也远远高过以最为流行和最为正式的“现当代文学”作中心概念的专书。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提供的资料并不完全，且有不少明显的错误。如，王宁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学史》是对国际上“新”的文学史理论的系统译介，与《中国文学专史》所应收列的“新文学”书目并无紧密的联系，但编者也误将之收入书目之中。见陈飞主编《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2—2106页。

新文学概念有着深刻而充分的历史依据。它不仅体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对白话文学的倡导与文学革命的成果这两层基本含义，而且更体现着新文学突破旧文学传统，建构新文学传统的根本诉求和本质命意。新文学家们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区域致力于建立和发扬新的文学传统，这是整个汉语新文学界的统一的意志行动，也是汉语新文学内在统一的根本依据，这一根本依据最终将中止人为的学科分割，促进汉语新文学作为一个学术整体为历史所接受。近年来“汉语文学”、“20 世纪汉语文学”或“中国现代汉语文学”等概念的陆续出现，^① 体现出学术界从概念上整合这一学术整体的跃跃欲试心理。

二 “汉语”作为中心词的理论意义

汉语新文学的另一中心词自然是作为语言种类的“汉语”。新文学传统当然会通过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加以承载，可在更沉潜更深入的意义上通过现代汉语得以风格论的呈现。这使得汉语新文学概念在理论上较之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国新文学概念更具优势。

中国现代文学或中国新文学概念以国家、政体为依据界定文学版图，带着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内涵有助于文学研究者更深刻地认知和更有倾向性地评价一定时代一定区域文学的精神价值，但把握不力也会造成对学术理性的某种负面影响。因此，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可新文学传统强调的语言革新因素甚至思想革命因素远远超过对国家、政体因素的考量。新文学所开辟的新传统以

^① 分别见朱寿桐《另起新概念：试说“汉语文学”》，《东南学术》2004 年第 2 期；黄万华：《中国和海外：20 世纪汉语文学史论》，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年版；曹万生主编：《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